



# 岩画研究



2017



ROCK ART RESEARCH | 2017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 /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岩画研究



2017



ROCK ART RESEARCH | 2017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 /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岩画研究. 2017 /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7-06829-7

I. ①岩… II. ①宁… III. ①岩画—美术考古—研究—宁夏—2017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9330号

## 岩画研究. 2017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 主编

责任编辑 姚小云  
责任校对 管世献  
封面设计 水 木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154

开 本 787mm×11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27-06829-7  
定 价 1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美好的梦想，都离不开矢志不渝，脚踏实地从点点滴滴做起。2017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也是我们《岩画研究》创建十五周年。在过去的十五个年头里，我们兢兢业业，每一步的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岩画界各方人士与各位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2017年这一年中，由中国岩画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联合主办的《亘古天书——中国岩画艺术展》，历经两年的时间，辗转北京、甘肃、广西和宁夏四地，终于圆满收官；“中国岩画保护利用与岩画新艺术创作人才培养”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并已开始面向全国招生。6月，国际岩画断代与保护中心考察大兴安岭及湖北岩画；7月，先后召开了“2017中国贺兰山国际岩画峰会”与“嘉峪关黑山岩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北方岩画国际工作坊”，10月底至11月初，“2017中日韩南阳鸭河凹穴岩画研讨会”和“连云港国际凹穴岩画峰会暨丝绸之路岩画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以及四川大学邀请瑞典隆德大学Michael Ranta博士进行讲座等活动，这些既凸显了民族特色，又深具国际视野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了我国丰厚的岩画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加强了新时代下岩画遗产文化价值的发掘利用和科学阐释工作，对于当代世界的文明互鉴，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我深信中国岩画在新时代下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与进步，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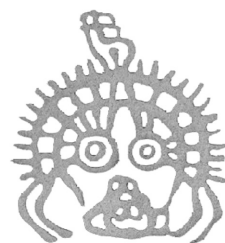
宁夏岩画研究中心

李彤

2017年11月8日

# 目录

Contents



## 探索与研究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岩画学科的研究范式及相关问题 ..... 汤惠生 / 003

Research Paradigm and Related Issues of Rock Art

*by Tang Huisheng*

浅析仙居岩画的纪念碑性 ..... 杨超 / 018

Monumentality in Xianju Rock Art

*by Yang Chao*

西辽河流域同心圆纹饰眼睛人面岩画再检讨 ..... 孙晓勇 / 029

Re-exploration of the Concentric Circles Ornamentation Eyes Human-Face Rock Paintings of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by Sun Xiaoyong*

焦伊斯基类型岩画年代研究 ..... 肖波 / 039

Study on the Age of Joyceki Type Rock Art

*by Xiao Bo*

玉树岩画的类型与分布 ..... 王晓琨 张文静 / 055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Yushu Rock Art

*by Wang XiaoKun Zhang WenJing*

“专业化游牧业”在青海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体现

——以牦牛岩画为例 ..... 杨惠玲 / 065

A Reflection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Petroglyphs from Tongtian River Basin in Yushu, Qinghai Province

——Case Analysis

*by Yang Huiling*

贺兰山车辆岩画研究 ..... 马波 / 071

Vehicle Rock Art of Helan Mountains

*by Ma Bo*

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馆藏岩画研究 ····· 赵占魁 李晓宫 / 080

Research on the Rock Art Held in Hetao Heritage Museum of China

by Zhao Zhankui Li Xiaogong

宁夏岩画中的“塔”图形研究 ····· 潘 晓 / 092

Study on the Pagoda Figures in the Ningxia Rock Art

by Pan Xiao

关于岩画专题展若干问题的探析 ····· 张 超 / 101

An Analysis of Several Problems about the Specific Exhibition of Rock Art

by Zhang Chao

宁夏石嘴山岩画的初步统计与分析 ····· 樊志威 / 111

The Primary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to Rock Art of Shizuishan, NingXia

by Fan Zhiwei

岩画学科与艺术史学的拓展

——再谈岩画学科的学术定位 ····· 陈 伟 / 119

Development of Rock Art and Art History

——Re-discuss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Rock Art

by Chen Wei

浅议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数字化成果及其应用 ····· 胡鹏程 / 128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Results in Zuojiang River Huashan Rock Art in Guangxi

by Hu Pengcheng

## 发现 DISCOVERY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田野调查 ····· 张嘉馨 / 141

Field Work on Jiangjunya Rock Art in Lianyungang City

by Zhang Jiaxin

2017 内蒙古赤峰地区岩画调查简报 ····· 刘思文 / 170

The Survey of Rock Art in Chifeng Area of Inner Mongolia in 2017

by Liu Siwen

## 保护 CONSERVATION

岩画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苏 胜 / 191

Problems in Protecting Rock Art

*by Su Sheng*

试论沧源岩画遗产的多重保护方法

——以沧源 1, 2, 6 号岩画点为例 ..... 苟爱萍 / 198

On the Multiple Protection Methods of Cangyuan Rock Art Heritage

——Take the Rock Art Spots 1, 2, 6 in Cangyuan as an Example

*by Gou Aiping*

## 钩沉 HISTORY

金沙江岩画调查手记片段

——洛吉河踏古 ..... 李 钢 / 211

Segments of the Investigation Diary of Jinshajiang Rock Art

——Visiting the Ancient Remains of Luoji River

*by Li Gang*

阴山岩画十年记 ..... 夏亮亮 / 219

Ten Years Record for Yinshan Rock Art

*by Xia Liangliang*

## 视野 OVERSEAS

发现与结论

——铀系测年、艺术的发展与尼安德特人 ..... Jean Clottes 马波译 / 227

Discoveries and Result

——U-series Dating, Evolution of Art and Neandertal

*by Jean Clottes*

阅读艺术 书写历史：南部非洲的社会变迁与岩画

..... Thomas A. Dowson 张嘉馨译 / 236

Reading Art, Writing History: Rock Art and Social Change in Southern Africa

by *Thomas A. Dowson*

伊朗西部哈马丹地区阿赞达雅新发现的岩画

..... Esmail Hemati Azandaryani, Yaghoub Mohamadifar,

Alireza Hejebri Nobari and Hamid Khanali 张超译 / 257

Azandaryan: New Found Petroglyphs in Hamadan, Western Iran

by *Esmail Hemati Azandaryani, Yaghoub Mohamadifar, Alireza Hejebri Nobari and Hamid Khanali*

岩画的考古学解读 ..... Robert G. Bednarik 潘晓译 / 269

The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Rock Art

by *Robert G. Bednarik*

伊朗扎格罗斯山南部费鲁兹阿巴德市 Abdozou 岩厦最新发现的岩画

..... Taher Ghasimi, Cyrus Barfi and Reza Norouzi 樊志威译 / 282

Newly Found Pictograms From Abdozou Rock Shelter, Firouzabad, Southern Zogros, I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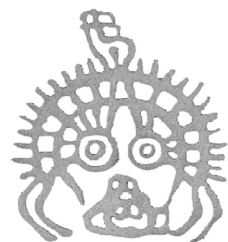
by *Taher Ghasimi, Cyrus Barfi and Reza Norouzi*

**信息 INFORMATION**



# 探索与研究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 岩画学科的研究范式及相关问题

汤惠生

**摘要：**中国的人文研究可分为两种范式：理论派和实证派。这两种范式从理论、方法论到学术目的和学术路线等方面均形成对照。从论证的方法特征上来看，“即物以穷理”的实证派多采用归纳法；而“立一理以穷物”的理论派则倚重演绎法。目前中国岩画的研究范式，多以理论派的演绎为主，关注点多在岩画自身的象征体系和文化意义。无论是理论派或实证派，均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包括岩画）也正在经历着转型，即从人文研究向科学研究发展。

**关键词：**范式；实证主义；理论学派；人文研究；科学研究

中国岩画研究发展到21世纪，俨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然而来自国内学术界质疑的声音和疑惑的目光仍羁绊着这门学科的发展，情况一如一个世纪前的欧美。这不能怪我国其他相关学术界，虽然我们可以将其习惯地解释为任何学科的独立都需要过程的发展和时间的积累。不过究其具体原因，应该是我国岩画研究发展的自身动力不足所致。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恐怕与我们研究范式的阙如有关。

---

纵观中国学术史，贯穿两千年此起彼伏的是汉宋之争。所谓汉学，其发

---

作者简介：  
汤惠生，男，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物可以上溯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倡导的研究古代典籍的方法，侧重于将古代典籍当作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注重利用文字的考据、训诂、辑补作为论据来注疏文本。东汉时的马融与郑玄将这个学派发展到巅峰，故又称“马郑之学”。宋代兴起的“宋学”是与“汉学”相对的一种学术概念，邓广铭将其定义为：“作为汉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乃是汉学所引起的一种反动”<sup>①</sup>。其宗旨在“微言大义”，注重经义阐述的“义理之学”，从而与汉学从理论、方法论到学术目的和学术路线等方面均形成对照。

历史进入到20世纪初，由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反封建主旨的强烈影响，中国学术主流所秉持的大旗，同样也是反封建主义，呼唤一个理性和批判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反映在史学界的启蒙思潮，大致可以以三个史学家的思想作为代表：顾颉刚、王国维和傅斯年，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20世纪20年代短短十年间新史学思潮三个阶段的代表。

第一个阶段是疑古思潮。1923年，顾颉刚在其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便已透露出疑古思想的端倪，开始认为正史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战国秦汉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由儒生“层累地造成”的过程。顾颉刚的疑古思想给史学界带来的是一种颠覆性的认识与观念，而对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带来的则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sup>②</sup>。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和非科学划分的证伪原则，他说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必要属性。<sup>③</sup>尽管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并没有将证伪作为一种验证理论的方法来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但将这种证伪精神带入历史研究中，无疑促使中国的古史研究趋于科学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证古。如果说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是一种“破”，王国维的证古态度则是一种“立”。1925年，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sup>④</sup>王国维的“证实”与顾颉刚的“证伪”看似对立的两个学派，但实则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新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对中国古史研究科学性及其地位的确立，功莫大焉！所以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百示来者以轨则”<sup>⑤</sup>。时至今日，学者们依然觉得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80多年后仍值得我们阐述和发扬”<sup>⑥</sup>。认为只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sup>⑦</sup>

第三个阶段是傅斯年旨在古史重建的科学考古。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史语所创始人的傅斯年，始终高擎反封建这面大旗。所以对待历史的态

① 邓广铭：《略谈宋学》，载《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3~176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页。

③ Karl Popper 2005.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17.

④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⑤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载《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248页。

⑥ 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22卷）。

⑦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度，毫不例外地认为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已僵化不堪，或“流为琐碎，而不关宏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未流竟如此无聊也”<sup>①</sup>。他主张纯客观的科学研究，倡导科学的实证主义，认为这才是革弊图新，与时宜之的办法。1928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谈道：“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sup>②</sup>。傅斯年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他有关历史研究的新思路：“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或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疏通的事业。”<sup>③</sup>他认为历史文献如《周礼》《世本》等是间接史料；出土文献如甲骨钟鼎文、简牍等是直接史料，而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扩充，也就是对直接史料的发掘和发现及对间接材料的考订和辑补，所谓史学只是对史料的整理之学。分开来讲，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他注重史料的考订与辑补，认为近代史学即史料学；而考古学，则要贯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sup>④</sup>这样一条以田野工作为主的学术路线，通过发掘与发现来扩充史料。这意味着将历史的研究主要理解为史料的考证、辑佚和整理。史学的任务既然只是“证而不疏”地整理材料，而非理论的阐释，所以史学的进步，也只能表现在以材料的辑补和扩展来衡量。傅斯年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展他的研究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sup>⑤</sup>同时，他为史料的扩充指明了一条新的途径，即走出书斋，进入田野：“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里的“读书人”指的是那些无论从事“汉学”还是“宋学”的书斋学者。他认为中国学术“未流竟如此无聊”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足不出户的学问们整日“整理国故”钻故纸堆造成的。他想引入重视田野资料、重视实验数据的西方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并以此来改造国学，建立他所谓的“科学的东方学”。所以他呼吁要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观念与风气，走向田野，“要实地搜罗资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sup>⑥</sup>。走向田野，扩充史料，可以说是傅斯年为近代历史和考古研究制定的发展方向。

## 二

1962年，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并在理论层面系统地加以阐述。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

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卷七，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②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卷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③⑤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卷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卷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式或模型。”

“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sup>①</sup> 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和路线等。从另一方面来讲，科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为了让别人否定，让人证伪，这也就是纠谬和修正的过程。范式的不断演化，从而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也就是库恩所谓的科学结构的革命。比之流派、学派等，范式这一术语更具有演变或发展之类的历史观，用胡适的话讲，更具有“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样一种“历史的态度”<sup>②</sup>；范式不像思想、理论、方法、技术路线等术语那样严格和显得刚性，而带有“风格”之类的个性和柔性，这便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或更广泛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讨论。<sup>③</sup>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历史研究可以分作众多的流派和思潮，但在范式语境中，只有汉学和宋学两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说的：“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sup>④</sup>。这两种范式从理论、方法论到学术目的和学术路线等方面均形成对照。从论证的方法特征上来看，“即物以穷理”的汉学多采用归纳法，而“立一理以穷物”的宋学则倚重演绎法。顾颉刚疑古，王国维证古，到傅斯年的科学考古，虽然标以不同学术流派的标签，但其研究范式却是一致的，这便是因袭了清代乾嘉以来“无征不信”的汉学实证主义传统，所以这一阶段同时也被称为实证主义新史学。

尽管二重证据法成为实证主义新史学的法宝，但对此持批评态度者，也不在少数。<sup>⑤</sup> 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论，不如说是一种目的论更为妥当，也就是说如果要研究当时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字，唯一的办法就是验诸文献，反之亦然。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二重证据法不外乎史实的澄清，如殷代高祖王亥是否实有其人，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悬案。王国维在卜辞研究中发现了王亥之名，考证出此人且被奉为高祖，从而为王亥的存在提供了原始的材料。又如《殷周制度论》，亦仍以史实的辨析为主题等等。事实上，“以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已有的文献研究历史，中国自古如此，何须标榜‘二重证据法’？”<sup>⑥</sup> 二重证据法对历史学的意义远远大于对考古学的意义，在考古学中强调二重证据法实际上很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二重证据法基本上只能用于文献与出土文字材料的互证，其他大量出土的没有文字的考古资料由于不适用二重证据法可能会被忽略。不仅如此，过分地强调二

①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171页。

②胡适：《实验主义》，载《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书店，1989年，第82~83页。

③西方考古学将其理论分作初级理论（low-level theory）、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高级理论（high-level theory）和范式（Paradigm）四个层次，分级越高，其内涵与外延就越宽泛。参见D.H. Thomas & R.L. Kelly 2006. *Archaeology* (4th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pp.50~75.

④[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⑤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页；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第6期。

⑥参见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353页。

重证据法定然会造成一家独大，甚至是独霸山头的局面，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考古研究理论和方法也会因此受到限制，显然不利于多样化的发展。过分强调二重证据法将会使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的附庸，“而不能成为一门独立提炼信息的学科”<sup>①</sup>，从而失去了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和意义。从整个古代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学是研究文献所反映出来的过去，考古学研究的则是物质文化所呈现出来的过去，二者所呈现出来的过去本来就应该不一样，二者的轨迹可能会交汇，但不应重合。<sup>②</sup>

傅斯年虽然号称用自然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在具体研究范式上，恰恰是清代朴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明确表示：“我们的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sup>③</sup>。对待材料“存而不补”，处置材料“证而不疏”，但他所说的“材料”，也只能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而已，因为他也是二重证据法的倡导者，而文字之外的材料是无法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互证的。这个“证”字道破天机，他强调的是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文字之间的二重互证互比，因为对文献而言，也只有地下的文字才能与其互证和互比。在《史料略论》一文中<sup>④</sup>，被他认为是范例的如王国维以卜辞证历史文献（《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关于王亥的考证），陈寅恪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吐蕃赞普年号《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王国维利用简牍所做的《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罗振玉据敦煌材料撰《补唐书张义潮传》，吴大澂据金文考“文”字，等等，无不透露其史学倾向。其实在他眼里，考古学只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是为历史学在田野中寻找和扩充史料的学科。

正如胡适在其《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所说的：“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文字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sup>⑤</sup>基于材料至上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的研究范式，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方法必然是考据与辑补，最终目的是编史和编年。不过到了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占据了统治地位，历史研究终于偏离了材料至上和二重证据法的实证主义归纳法轨道。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更倾向于演绎法，这似乎是对“立一理以穷物”的宋学的声援。自此以后，被汉学压抑了几百年的宋学才有了出头之日。汉宋并举，作为研究范式，开创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景象。

不过考古界却依然故我：史料仍然至上，二重证据法仍然独领风骚。虽然表面上我国“考古学的研究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sup>⑥</sup>，国外学者也将我们的考古研究范式贴以马克思主义的标签，<sup>⑦</sup>但事实上，正如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所指出的，在考古作业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发挥很大的具体作用”<sup>⑧</sup>。即便

①参见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353页。

②参见 N. D. Cosmo 2002.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 Schaberg 2001. pp.2~3.

“Texta and Artifacts: A Review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Monumenta Serica* 49: 464~465;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31页。

③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七，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⑤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4页。

⑥夏鼐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⑦ Kevin Greene 2002.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4th Edition). Routledge. p.145.

⑧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4页。

是一般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也很难指导考古学，苏秉琦对此有着更加真切的体会：“当年写教科书，就是拿着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框架，把考古材料塞进去，以为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了，其实只是戴帽穿靴。编到最后，教师说这不是考古学，学生学这个没有用。献礼之后，我们去陕西华县发掘，还是要摸陶片……我们不能用社会发展史代替中国历史，这是属于不同的范畴，不同的层次。”<sup>①</sup>

情况确乎如此，在具体的考古研究中，考古界至今仍奉材料和二重证据法为主臬，认为考古学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夏鼐把实物资料（考古）和文献资料（狭义的历史）均绑在历史研究的马车上，从而形成“历史学科（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sup>②</sup>；张忠培“让材料牵着鼻子走”<sup>③</sup>的学术路线，至今仍在考古学研究中普遍加以贯彻；田野发掘一直恪守着傅斯年年以来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史料学传统，考古报告的编写也是遵循着“证而不疏”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写近代考古学的报告本当如此”<sup>④</sup>的原则。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汉学的实证主义传统自傅斯年以来，就一直是考古研究的主流范式，而且时至今日，情况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清代朴学的考据和辑补在考古学中变成了类型学，编年和编史转换成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和时空框架，二者可以说是同途同归。

中国考古界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史料派都尊为神明，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范式是相互抵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是以唯物史观阐释过去，是要注疏的，而史料派却“证而不疏”，一如张忠培所说的：“考古学家只能让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关系从自己的头脑中蹦跳出来，切不能用别的学科结构，哪怕是那些被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取代对考古遗存的具体研究。”<sup>⑤</sup>比如《元君庙仰韶墓地》1983年出版时，张忠培在结语中套用摩尔根和马恩“家族、氏族、部落”的民族学概念来解释元君庙墓地三种墓葬形式。但这显然不符合他自己所说的让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关系从自己的头脑中蹦跳出来的说法，也不像傅斯年所说的事实自然流露，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一种推论。后来张忠培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说若再写这本书，他不会再套用家族、氏族和部落的概念了。<sup>⑥</sup>后来他在《黄河流域史前合葬墓反映的社会制度的变迁》一文中也确乎这样做了：“依对元君庙墓地的分析，上述亲属单位组成墓区，又由墓区组成墓地。如果把合葬墓为代表的亲属单位视为一级组织的话，那么墓区则为二级组织，墓地则为三级组织。”<sup>⑦</sup>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史料派这两种研究范式其实是很难兼容的。不过这主要是史料派自身的原因，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史料派“证而不疏”的学术特征与其他范式的研究都是难以兼容的。

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的流行，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证而不疏的史料派

① 苏秉琦：《圆梦之路》（下），《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有趣的是尽管苏公在此文中将他的“区系类型”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体系”，但这个体系与马克思实在是没什么关系，而更像是“戴帽穿靴”。

② 夏鼐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③ 参见张忠培：《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载《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301页。

④ 傅斯年：《城子崖》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三，第237页。

⑤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载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301页。

⑥ 张忠培：《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文物天地》，1989年第3期。

⑦ 张忠培：《黄河流域史前合葬墓反映的社会制度的变迁》，《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包括考古类型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与流行,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都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即需要对史料进行甄别与建设。汉学的兴起正是在这种历史要求下应运而生的,也就是汉儒对先秦轶散和失传文献的辨审与厘定;清儒则有感于“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所以乾嘉学派要“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sup>①</sup>;20世纪20年代,新史学的汉学范式同样是为了重建被疑古学派所击碎的史前史和上古史,需要对资料甄别与扩充,而中国考古学作为历史学扩充材料的途径之一,从一诞生开始便带有与生俱来的史料学血统。被认为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理论来源的兰克学派(Leopold von Ranke)亦然。19世纪的历史学要脱离宗教神学的控制,要从政治、文学和艺术等人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探究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什么(what had really happened)的一门科学(scientific history),所以强调史料的客观性便成为首要问题。<sup>②</sup>1949年以后,旨在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初创时期,“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自然——同时也是必然——地成为主导思想。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辨审,张忠培的“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让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关系从自己的头脑中蹦跳出来”等观点看上去似乎是承袭傅斯年的材料学思想:“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或直接脱胎于胡适的“文字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sup>③</sup>一语,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傅斯年和胡适的“跟着材料走”一语有一个语境,即“文字”。“文字材料是死的”,指的是文字的各个义项是规定好的,其含义是设定好的,容不得,也不必借助任何理论加以解释和探讨,只能并只需跟着材料(文字所规定的意义)走即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显然也是指文字材料,也就是说胡适和傅斯年的“材料”仅仅针对历史时期的文献文字材料而言。但若非文字的史前考古材料,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没有文字的规定和导向,便无法跟着材料走。这时的材料学便不再是考证学了,文字材料中的“事实”可以“自然显明”,非文字的材料是无法使事实“自然显明”的,其中的“逻辑关系”更无法自然从“头脑中蹦跳出来”,而必须在理论层面上加以演绎或归纳才能被认识。美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将实证分作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所谓直接证实,就是将待证实的命题与我们当下的经验做比较。任何一个对于当前的知觉有所断定的命题,都可以用我们当前的知觉和经验直接地予以检验;所谓间接证实是指对于一个不可能直接证实的命题,只能通过逻辑推演和推导来加以证实,换句话说,也就是相关理论的运用。<sup>④</sup>

当然,作为方法论,也不是不可以在没有文字的史前研究中也“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我们或许可以将出土遗物的形制、纹饰、质地以及制作方

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

②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7年,第247~270页。

③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④ Carnap, R. 1963.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 Chicago: Open Court. pp.3~86.